



一切权利归农会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黄金魁 / 著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丛书 ——

丛书主编 / 罗平汉

以纪实笔法写作，既有历史的真实描述，又有现实的理性思考。以宽大高阔的视野、纵横交错的思路、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挖特有的时代蕴意，写出历史的凝重，揭示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金魁，湖南耒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惠州学院思政部讲师。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视野下的〈红旗〉杂志研究（1958—1966）》。论文《毛泽东国家政权建设方案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代启示》获惠州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

策划编辑 / 荆彦周

责任编辑 / 唐 丽 高 菲

美术编辑 / 于艳红

责任校对 / 付敬华

ISBN 978-7-202-09487-7



9 787202 094877 >

定价：4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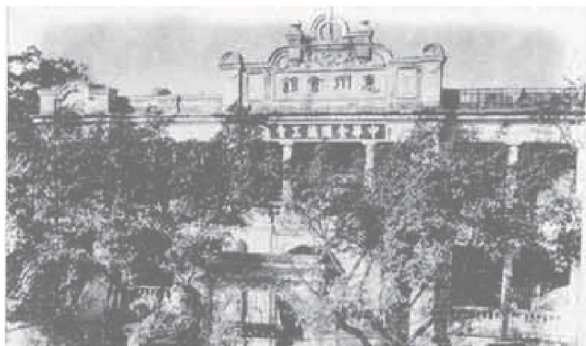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丛书 ——

丛书主编 / 罗平汉

一切权利归农会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黄金魁 /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权力归农会：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 黄金魁
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6
ISBN 978-7-202-09487-7

I. ①一… II. ①黄… III. ①农民运动—历史—研究
—中国—1924~1927 IV. ①K26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197 号

丛 书 名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丛书
书 名	一切权力归农会——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丛书主编	罗平汉
著 者	黄金魁
策划编辑	荆彦周
责任编辑	唐 丽 高 菲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42 000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9487-7/K · 1124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走向民间	(7)
一、“向农村去”	(7)
二、衙前农民运动	(16)
三、海丰农民运动	(24)
四、岳北农民运动	(31)
第二章 再识农民	(38)
一、“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38)
二、“限租”“限田”	(45)
三、“结成团体”	(50)
第三章 合作旗下	(56)
一、“谋农夫之解放”	(56)
二、设立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	(62)
三、“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	(72)
四、“革命党与农民的第一次见面”	(81)
第四章 唤起农民	(87)
一、“工农联合起来”	(87)
二、“农村运动的方法”	(98)
三、“耕地农有”	(104)
第五章 风起云涌	(115)
一、广东的农民运动	(115)
二、湖南的农民运动	(137)
三、湖北的农民运动	(141)
四、其他省区的农民运动	(146)
第六章 乡村巨变	(156)

2 一切权力归农会

一、“组织起来” (156)

二、“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175)

第七章 走向暴动 (192)

一、“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192)

二、“左倾幼稚病” (203)

三、“霹雳一声暴动” (223)

结束语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52)

绪 论

“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①这是毛泽东 1936 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所说。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民问题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20 年代，中国大地上曾经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几乎波及了大半个中国，从南方的广东，到北方的内蒙，从东部的江浙，到西部的川陕，更不用说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蓬勃的湘鄂赣。这场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初尝试，对中国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建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于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多本相关著述，主要有：高熙的《中国农民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8），杨绍练、余炎光的《广东农民运动 1922 年—1927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王全营等的《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曾宪林、谭克绳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陈富安、谭克绳的《湖北农民运动史》（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等。这些著作，从革命和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对全国或某省的农民运动进行了系统叙述，并对某些重大事件的脉络作了梳理介绍，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但由于史料及研究视角所限，一些问题并未能得到深入和全面的解析。

2000 年以后，专门研究农民运动的专著并不多，但与此相关的则不少。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史料的运用更加广泛。随着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新的口述资料的运用，使得农民运动的研究更加具体化、精细化。同时，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相关资料，被部分研究者所使用，故有关农民运动的研究更客观和立体。其二，研究的视角更加多样，一些著述把研究的视角从革命范式转向了诸如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组织传播等角度，诠释农民参与、政党动员的方式和成效。

专门以农民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当数梁尚贤的《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该书 62 万余言，充分运用了两岸各种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存的与农民运动相关的资料。该书从国共合作的宏

^① 埃德加·斯诺，宋久、柯南、克雄译：《斯诺文集·复始之旅》，第 208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一切权力归农会

观视野出发,详实地展现了国民党对广东农民运动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决策、实施及其影响。通过广泛收集、综合运用各种资料,以及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该书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与这个时期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一样,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下共同进行的,而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成功或失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也不能“把持”“包办”广东农民运动,而且国民党也不是毫无作为、坐观广东农民运动的成败。也就是说,“合国共双方之力,才会有广东农运的规模和声势,单靠任何一方之力,广东农运都难成气候”。^①

专题化且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有一定关联的著作,主要有李永芳的《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魏文享的《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李著第三章“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对中共领导的新型农会组织的建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领导机构的设置及其农会章程的制定、国共合作旗帜下各地农会的发展,以及农会的基本结构、活动经费、主要活动、农会的历史作用与局限性等作了详细考证与论述。该章中,作者对农民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及原因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这些“不少的‘左’的偏差和错误,给农民协会的自身发展乃至整个国民革命均带来了负面影响”。作者认为,产生“左”的偏差和错误的原因,既有农民协会成员构成的阶级根源和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也与当时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水平与指导能力欠缺有关,还与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导有关。^② 魏著第二章“革命化政党与农民组织化道路”,对中共的早期农运模式、中国国民党的农民组织观以及国民党农会政策的转向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深入乡野、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的组织方式以及所构建的“政党—农协”的农运模式在指导农民运动中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国共合作中国国民党中央对农民协会组织方式的接受,则可以看作是国民党对中共已推进的农运路线的认可。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农运主张的差异,最终农民协会的兴衰影响着国共合作的政治格局。^③ 在与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相关的章节中,李、魏两书虽然研究对象一致,但研究的视野却各有千秋。李著侧重于对农民协会组织模式的具体分析,魏著则把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运动的动员模式进行分析。

另外,罗平汉的《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论及

①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第7、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② 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第335、3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③ 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第39、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认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对农民问题认识的系统和深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调查紧密相关。作者着重介绍了彭湃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及其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尤其突出介绍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内容。作者指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毛泽东看到了农民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为他后来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他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他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就研究视角转换与扩展方面，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陈德军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两书值得一提，两书虽然都不是专门研究农民运动的著作，但也都论及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于著将早期发生过农民运动的湖南衡山“岳村”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岳村”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关系、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该书第二章第二目“农民运动与乡村传统”，对岳北农民运动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叙述和分析，认为：（1）这场农民运动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由现代政党直接发动和控制的社会革命；（2）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3）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将政权和族权彻底否定，但由于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改变乡村社会形态。^② 该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作者重走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以深入的乡村社会调查作为研究基础，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以“岳村”为个案，来剖析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陈著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赣东北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类型，以及乡村社会关系对农民运动的影响。该书第一章第二目“最初的引入：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村战略在赣东北的早期实践”，分析了国民革命时期赣东北的农民运动和农协的情况，认为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活动，直接影响农民运动在赣东北乡村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程度规模，同时当地的农运水平，也取决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在地方上的声望等级，以

^① 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版，第2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② 于建嵘：《岳村政治：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第169、1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一切权力归农会

及他能调动多少地方资源来支撑农民运动的局面。^①该著以赣东北的农民革命作为个案,充分挖掘地方档案资料,从农民的主体角度出发,研究革命在乡村社会的发生发展,梳理作为农运主体的农民与革命者的互动,为深化农民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扩展方面,还有一些论文。何扬鸣、郑建华(2001)对当时新闻界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的新闻舆论宣传进行了研究,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第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各种新闻媒体纷纷对之加以报道并发表评论,激起了强大的社会舆论。^②姚曙光(2003)分析了农民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因素,认为盲目崇拜农民、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财产私有制、运动贫苦农民对乡土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是湖南农民运动民粹主义思想潜流的重要表征,涌动于乡土社会动员中的民粹主义是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③梁尚贤(2006)分析了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左”的错误,认为出现某些过火行为,其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国民党对农民的错误态度,引发了农民的过火行动;二是共产党部分领导人物的领导不力,指导不当,助长了农民的过火行动。文章认为,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命全局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④邹文娟(2006)分析了农民运动的心理原因,认为农民因生活在混乱、无助的环境中,深受压迫和剥削,又遭受天灾人祸的袭击,处在一种易感的状态,并产生对剥夺者的强烈敌意以及对和平、富足、互助的强烈渴望,这种心理状态使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接受革命观念的输入而参加革命。^⑤罗振茜(2014)分析了农民运动中的“反市场”行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平粜阻禁谷米”是一种反市场的行为,它造成了农村“联合战线”的危机,并对武汉政府最终决定分共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⑥这些文章深化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研究。

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台湾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佟以群(2006)探讨了彭湃与初期海丰农民运动间的“人地关系”,即海丰佃农、自

① 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1924—1934)》,第43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② 何扬鸣、郑建华:《“衙前农运”及其新闻舆论宣传》,《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③ 姚曙光:《国民革命失败的民粹主义因素分析——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个案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邹文娟:《论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之心理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

⑥ 罗振茜:《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平粜阻禁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耕农兼佃农生活的贫困与以彭湃为代表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的两大根本因素。^① 文章的一大亮点则是对陈炯明与农民运动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认为陈炯明对农民运动支持与否,实际上直接影响了农会合法存在的地位。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七五农潮”致海丰农运受挫,最终促使彭湃寻求政党对农运的援助,这成为此后彭湃主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干部的出发点。郑建生(2007)分析了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主张(即土地革命)与孙中山关于土地政策的不同,跳开一般正常法庭审理程序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及其在文化上、道义上对“以往乡野村民尊崇的绅士与地主阶级”的“妖魔化、污名化”,提出“武汉国民党政府激烈过火的群众路线引起内部革命军官的强烈反弹,最后爆发了两起严重的军人政变”,最后,“军人的叛变迫使武汉国民党中央改弦更张,放弃原本的联共和群众路线,采取了分共政策与管制群众组织团体的新措施,武汉国民党中央所支持的农民运动也就划下句点逐渐消退了”。^② 郑文对国共合作下的农民运动激进政策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视了从农民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探究激进政策出现的深层原因。

西方学界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黄家猛(2013)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总结。黄家猛从农民运动的起源、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农民参与革命的动机、农民运动发生的地点、国民党与农民运动、土豪劣绅等方面总结了西方学界近三十年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③ 黄家猛认为,西方学界的研究过于注重微观的研究,而忽略了从更加全面的视野理解农民运动,注重对少数农民运动领袖人物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众多基层干部的研究,而且很少使用新发掘的史料。他同时强调,西方学界对国内学界本课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台湾学者陈耀煌(2010)也对西方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有关中共农村革命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从研究视角而言,陈耀煌认为地方研究已成为西方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④ 另外,大陆学者潘世伟、徐觉哉等主编的《海外中共研究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一书中,也有对西方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相关著作的介绍和评述,如R·霍夫海因茨的《大浪潮:中国

① 佟以群:《彭湃与海丰农民运动 1921—1924》,《中正历史学刊》(台北),2006年第8期。

② 郑建生:《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武汉政权为中心的探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③ 黄家猛:《近三十年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④ 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台北),2010年第68期。

共产党的农民运动（1921—1928）》、韦慕庭的《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等。在此，笔者不再一一介绍。

总揽海内外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研究，既有从总体上、宏观上的研究，也有微观个案的研究，既有相关人物的专题研究，也有重要组织的专题研究，而且一些与中共党史、革命史，甚至社会文化史的相关著作，有时也会涉及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相关问题，这些著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参考。但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历经数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兴衰成败之间留下诸多话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将在全面叙述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详细研读各种相关资料，试图就以下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其一，进入乡村的革命的分子是如何与乡村社会的农民实现互动的，有一个怎样的“介入与回应”过程。农民对于乡村产生的革命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以及外来革命者的革命思想传播和组织动员，历经了怎样的博弈，亦即在政治动员和组织传播方面，革命知识分子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方式。

其二，关于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及其策略，以及农民运动中的“过火”问题，即“左”的错误问题，它是否可以避免，而且是否可以通过抑制这些“左”的错误，避免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与此同时，“左”的根源及其对农民运动自身的影响该如何审视，都需要作更深入、更客观的分析。

其三，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乡村社会文化以及乡村社会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村社会文化又是如何抵抗和消解革命文化的。农民运动给乡村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的变动，更有对农民所习惯了的乡村社会文化和乡村社会关系的冲击和改造，这种冲击和改造，又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文化，其利弊流变都值得深入探究。

第一章 走向民间

一、“向农村去”

话说武昌首义后，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始了民主共和的尝试。不过，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让出大总统职位后，民主共和并没有在中华大地顺利实行，迎来的不是袁世凯大总统和辫子军头领张勋的复辟闹剧，就是北洋各系的相互争夺、倾轧，民主共和仅剩一块招牌。在这块招牌下，民国的政局，政治纷争不断，军阀混战连连。虽然革命党人先后发力，希图保卫民主共和，但最终均无所成，是可谓：“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①

其间，一些志士仁人在寻求新的变革方向。1917年的“十月革命”，让俄罗斯这个古老的国家依靠工人、农民等普通民众的力量，建立了劳工的专政。这种新的国家政权形式，让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看到了新的革命方向。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民间，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随着工人阶级一道，进入他们的视野。经过观察和思考，他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很有见地的认识。其中一些人还深入乡村，对农民进行最初的革命启蒙。

李大钊是较早觉悟到农民力量的革命先驱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先后多次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论述农村和农民对于变革中国的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他在北京举行的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集会上，就以“庶民的胜利”为题发表演说，盛赞世界劳工。他说，一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是“庶民的胜利”。他认为，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

^① 孙中山：《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年11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 1919.1—1921.11》，第6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界”，他呼吁大家“快去工作”，“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当一个工人”。^①

在此，李大钊用“庶民”“劳工”等词，有时候还用“平民”一词。这些词在当时非常流行，所指都较为宽泛。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甚至把“劳工”定性为能够涵盖几乎所有人的一个词。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的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②文学家朱自清对“民众”的界定相对狭窄些，他说，他所谓的“民众”，大概有三类：一是乡间的农夫、农妇，二是城市里的工人、店伙、佣仆、妇女以及兵士等，三是高等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等学校学生、商店或公司的办事人员、其他各机关的低级办事人、半通的文人和妇女。^③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些词的所指，越来越倾向于下层人、底层人。当时“劳工神圣”的社会思潮，是平民主义社会思潮对穷人、对劳工、对农民等下层民众的尊崇，以及对他们力量的认同。所以，他们在颂扬“劳工神圣”的同时，倡导“到民间去”的社会活动主张。

1922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④呼吁青年“速向农村去”。文章中，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因此，青年如果“想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

关于中国的农村状况，李大钊作了较为清楚的描述。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了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

李大钊还对农村的社会阶层，进行了简单的区分和剖析。如，有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厚拥田畴的地主、有专做农工的佃户、有专待雇佣的工人。他认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而且，“他们自己

①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 第2卷 最新注释本》，第254～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②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60号，1918年11月27日。蔡元培著：《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8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③ 朱自清：《民众文学的讨论 四》，《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6期，1922年1月21日。

④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 第2卷 最新注释本》，第304～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辱，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地主总是苛待佃户与工人，佃户与工人不但不知互助、没有同情，有时也做自己同行的奸细，去结那地主的欢心。”

通过对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描述和分析，李大钊感叹道：世界潮流早已开始走向“民主政治”“扩张选举”的时代，中国的农民依然只能任由“官绅们宰割蹂躏”。由此，他进一步向青年分析道：“你们要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文章最后，李大钊呼吁：“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这里，李大钊实际上是向青年和知识分子提出了进入农村，启发农民觉悟，运用农民的力量来实现变革中国的思路。

李大钊还积极支持青年的社团活动，鼓励他们研究社会主义，走向民间。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等来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与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代表，举行商讨团体联合的茶话会，李大钊应邀参加。座谈中，李大钊提出，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①18日，李大钊出席觉悟社等五团体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联络筹备会。次日，又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的茶话会，继续商讨各社团联合和“到民间去”的问题。在李大钊的帮助和鼓励下，五个社团经过多次商讨，决定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社团，并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在“宣言”中，他们提出：“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在“约章”中，他们列举了“改造联合”计划进行的事项，有“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②李大钊曾希望“改造联合”这个组织，能够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但是由于各社团，尤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比较复杂，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不过他们提出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农工组织之运动”等计划，确实指出了社会改造的正途。

^① 孙钢：《伟人之初 周恩来》，第10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② 《改造联合宣言》（1920年8月），《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五四运动在天津》编写组编：《五四运动在天津 历史资料选辑》，第614、61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